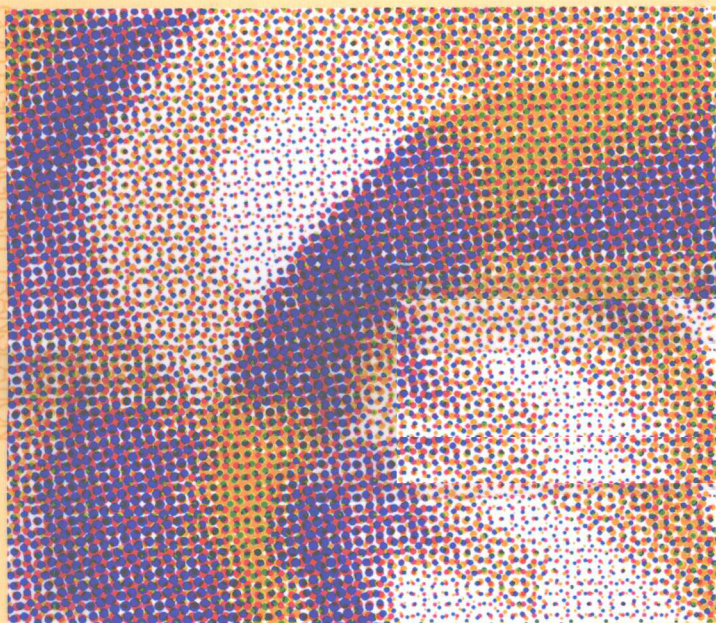


高等学校翻译课程系列教材

新译学 论稿

王宏印 著



高等学校翻译课程系列教材

新译学论稿

王宏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译学论稿 / 王宏印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3
(高等学校翻译课程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3390-4

I. ① 新… II. ① 王… III. ① 翻译理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112 号

高等学校翻译课程系列教材

新译学论稿

王宏印 著

Xinyixue Lung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 × 260 mm 16 开本

印 张 28

字 数 686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新译学论稿》是作者近来关于中国翻译学建设中一系列问题思考的结果，几乎涉及译学建设的方方面面，许多观点在学界是首次披露，一些材料和选题体现了个体研究的独特性，例如：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诗歌翻译研究、文学翻译批评、民族文学与典籍英译，以及穆旦（查良铮）研究、吴宓研究等。虽然内容复杂多变，但并非庞杂散乱，而是统归文学翻译和批评性研究，分属于不同栏目，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却始终不离开基本问题。其讨论本身又有相当的思考深度和学术前沿的性质。其中有一些是新近的思考，例如文笔与译笔问题、文史哲如何打通等问题。本书的写作和修改体现了一些复杂的加工程序。除了一些分开发表过的文字之外，若干现成的文字（例如专著和译著的序言和学术发言，一般皆在一两万字，杂志上无法单独发表），仍然需要仔细修改，纳入一定的系统。有些部分要重新写过，还有的原来只是个题目或提纲，需要抽出时间专门撰写，才能完成。全书分为十辑，包括作者研究的诸多方面和一定的理论体系建设，同时体现个人语言特色和学术批评话语。全书前有导论后有余论，每辑前有导言，导言导论本身又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常常是相关论文的片段或节选，而不是一般的穿靴戴帽、落于俗套的文字。总之，作为文集荟萃，本书凝聚着作者多年的研究心血和教学智慧，学界有称为“翻译学的中国化道路”的，但又有较强的个体化研究特色和个人写作风格，姑且名为“新译学论稿”，权作对中国翻译学建设的一份贡献吧。



导 论 自由出入于学科之间才能做大学问

——简论文史哲之间的入与出	1
---------------------	---

第一辑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终结与更生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资料的整理与理论的阐释	6
第二节 融合创新之途：新译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译论	14
第三节 中西译论之间：昔日的文质与今日的直译意译辨析	26
第四节 中国翻译学建设十大问题与文化转向在译界的十大表现	32

第二辑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吸收与融合

第一节 借鉴西方传统：批评的概念与当下的趋势	41
第二节 翻译研究学派与中国当下的翻译学研究	49
第三节 传承与超越：关于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翻译观	55
第四节 归化异化三论：从翻译策略到翻译过程的展开	62

第三辑 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翻译及批评

第一节 国学之维：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理论与技巧	70
第二节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道德经》第一章英译略论	82
第三节 “合则流媚，乖则雕疏”：评孙大雨译唐人《书谱》	96
第四节 关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及研究的三大任务——在第五届全国典籍 英译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108

第四辑 民族典籍翻译与评析

第一节 追寻远逝的草原记忆：《蒙古秘史》的复原、转译及传播研究	115
第二节 君王荣耀之镜，典籍外译的福音：《福乐智慧》英译本特点分析	125
第三节 作为领域和课题的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以维吾尔族宗教经典 《福乐智慧》为例	134
第四节 远古英雄的传唱与回响：论藏蒙史诗《格萨尔》的域内翻译与 世界传播	146

第五辑 西方经典的翻译与评析

第一节 世界文化典籍与西方文明视野中的人文精神	165
第二节 世界文化典籍汉译的理论、体例与技巧	181
第三节 To Be or Not to Be:《哈姆雷特》译者序言	196

第四节 作家手眼,译家风韵——写在《赫兹列散文精选》评点后	211
第六辑 《红楼梦》及其翻译研究	230
第一节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实现“《红楼》译评”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231
第二节 《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前言)	238
第三节 试论霍译《红楼梦》体制之更易与独创	245
第四节 吴宓《红楼梦》研究论纲	253
第七辑 汉诗英译、复杂汉译与杂合创作研究	262
第一节 如将不尽,以古为新:论《诗品》今译和英译中的人称变换	263
第二节 一语天然,常译常新: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	269
第三节 《七湖诗章》与《刘彻》:杂合创作与复杂汉译	280
第四节 重铸雄奇瑰丽词,别求知音于异邦: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	292
第八辑 西北民歌与民间文学翻译研究	317
第一节 西北回响:让激情在黄土高原上燃烧	319
第二节 努力探索中国民歌走向世界的歌唱语言	323
第三节 西北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高建群小说《舐犊之旅》 英译论稿	344
第四节 诗意与写意——秦腔新编历史剧《西湖遗恨》唱词英译略论	357
第九辑 翻译批评的原理与理论建设	365
第一节 文化的分层概念与文学翻译批评基础	366
第二节 研究与批评: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方法论考察	370
第三节 文学翻译批评的文本、文体变异与互文性	375
第四节 笔墨当随时代:翻译笔法的本体论阐释与现象学描述	381
第十辑 翻译批评的个案分析与翻译家研究	393
第一节 译苑巨擘,艺坛慧眼:傅雷的文学语言观与译笔考辨	395
第二节 不屈的诗魂,不朽的译笔——纪念诗人翻译家查良铮逝世30周年	408
第三节 诗性智慧的探索——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	420
第四节 译事三味,甘苦一心:读刘士聪教授《翻译与鉴赏》兼谈散文翻译	428
余 论 回顾与迈进,择其善而固执者也 ——关于当前学术研究的若干反思性意见	434
附 录 王宏印主要论译著	438

自由出入于学科之间才能做大学问

——简论文史哲之间的入与出

人生求学要经历一个整体的悟的阶段，由此可以进入人生和学问的最高阶段的认识。对于一个人的为学之道而言，到了成年和成熟时期，是否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乃是个人学术能否持续获得创造性资源和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舍此就只能在一个狭隘的专业领域里缓行，取得点滴的进步而自以为满足。这里便有了“大知”和“小知”的区别，“大言”和“小言”的分野。对于文科各领域而言，更是如此。简而言之，一个人在求学和做学问的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大的学科分类和各自的特点，结合自己的专业和专长，多联想勤思考，尤其需要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例如语言、思维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留心观察和积累见解，以便获取为学之道的总体感悟和原理性的掌握，争取为学的自由，取得理想的学术成就。这里仅就一些基本问题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与大家共同商议和相互勉励。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学问上的“体用不二”。“体用不二”是佛教的认识，即本体（空）与现象（色）或功用（业）的统一的认识。我们借来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就是把知识和门径和本体视为一个整体，可以从此门入，从彼门出（如梁启超以佛学理路入历史研究而有大成），或者从彼门入，从此门出（如陈寅恪援历史笔法写《柳如是别传》而别出新意），也就是所谓的文史哲合一的认识。这是一个根本的认识，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说明和根本的解决，也就是文科各学科间的方法论的解决，同时也是一种返归本源的诉求式的解决。其要义有三：

其一是文，指的是文学、文本、话语。我们视之为世界与人生之表征，进入这一通道也就接近于从现象切入本体的意思。但是这里的现象已经不是事物本来呈现出来的样子，而是经过了文学家（广义的作者）的创造和文本的加工，渗透了前人今人的理解和说明，呈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大量的经典文本要你去阅读和掌握。这种阅读和掌握过程，作为文科最基本的学习活动和知识呈现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语言的认识和掌握的过程，因为通过话语的文本的阅读、记忆和思考，你可以直接获取他人的思想和表述方式。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过程和思考功夫可以把思想的作者与作品及世界的关系直接呈现给读者和学习者（当然归根结底这种关系是蕴涵的，可以有分际的）。虽然这里有一个吸取、记忆、转述以至于认同他人思想的过程，但这是一个必需的阶段，这可以造成无知向有知的转化，可以积累学问、经验和见解。

尤其对于实践经验不多，而接触世界较少的人来说，由语言学习及文献的阅读进入学问，是一条必由之路。它可以他人之见解或间接经验弥补个人直接经验之不足，但是否能转化为直接知识，则需要个人的反思和考察功夫（即苏格拉底所谓的“有省察的人生”），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在一个学科有足够长的历史和该学科知识累积的意义上，也可以造成一般历史、文明史、学科史和理论史（学术史）的系统知识，也可以造成各门具体科学的

原理性的认识和综合性的知识，但充其量是编写式的、累积式的体现。它在本质上不是“物质性的”（即本原性的、本体性的），而是符号性的（即表现性的、表述性的）。如果说这其中也有思想，则文学的思想（一切艺术在原则上亦然）是想象性的、体悟性的、感觉性的，而不是分析性、推论性的，或者思辨性的。但若扩大到整个学术话语和一切科学与哲学文本，则分际不必如此截然和绝对。或者说，从文本入手的学问，距离情感和思想更近，而距离事实和真实的世界还有一段距离。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和反对“本本主义”，就反映出这种清醒的认识。

其二是史，也就是历史、事实、规律。我们认为它作为世界与人生之真相，需从事实切入，通过一定的途径进入认识的范围，即直达世界的真相和认识的真理。但学习不会如此直接和简单。一是事实不会赤裸裸地出现在你面前，二是事实本身也不一定等于人对它的认识。即便是历史知识，许多时候也是通过阅读和符号性的掌握（例如读《二十四史》）来汲取和完成的。切不可忘记，那些书本上的事实，只是语言阐述的事实，而不是“物质的”事实。物质的事实在历史学里是物质的证据，即器物 and 地下出土的文物作为证据，它们是直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可惜这种直接的证据在数量上十分稀少，远远不能达到构思和理解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整体图景的程度，需要补之以想象和推论，即事实的推论。在历史学领域，其他民族的认识作为间接知识，即便是事实，由于语言与文化的隔膜，也很难进入真正的通观性的理解过程，要作为推论性知识而掌握或用于本民族的理解，则更为困难。这里就有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文献与文物）和三重证据法（再加上世界其他民族的“普遍性”证据）的分野]。可见，历史如果只有事实而无思想，或者缺乏对事实与世界的理解或解释，则不能算是学问。将一切视为既定事实而无法改变或无法重新认识，乃是对历史的僵化的态度，是以“事实”扼杀思想的有害之学。无论是社会史，还是学术史、文学史、艺术史，都应作如是观。

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需要获取的事实证据，不都是物质的，还包含行为的和体制的，但都可以通过调查、测量和实验加以获得，有时候是强迫性的获得，或曰索取。不能进入观察和实验过程，难以在活动中掌握，甚至在统计学上也显示不出来的，就不能算做可靠的科学的知识，即事实（数据资料）。或者只能是假设，或无法验证的思想，例如哲学上的思想，许多就是无法用事实来验证的，但可以有逻辑的或其他分析性的验证方式。当然，哲学的真理是另一重意义上的真理，只是可能的真理，不等于事实上的存在才是真理。而真正的历史科学并非只是事实的收集和记忆（培根认为历史是记忆的科，有点浅，但若认为历史是经验科学，则切题），而是进入到历史事实及其关系之间的因果勾连，从而构成时间中的事件的前后关系序列。系列事件和因果关系的反复出现形成规律性的认识，以至于达到可预测的程度，即通向未来之愿景。这一关于历史的知识虽然是经验的或实证的，但可以适合一般历史，也可以适合各学科的历史和人类的认识史。历史学应是获取、掌握和整理资料的学问，但它本身也需要思想和方法（甚至历史哲学），而且可以成为一门入门的学问，同时也可以是一门总结性的学问。新历史主义混同了事实和解释，将记叙和解释视为高于事实真相的考据（须知辨伪在史学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功过参半的影响，值得注意。

其三是哲，即哲学、哲理、理论。它给我们的是关于世界与人生之理解和解释，往往以理论形式呈现。哲学可以培养思辨和玄思，学会思考和论辩，因此从哲学出发，也就是从思想出发，从原理切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哲学的切入，是思想的切入，和理论的



切入，许多是假设的切入，而不是定论的切入（最好不要认为有定论）。它的好处是可以有思想，或者甚至是现成的思想作为参照或出发点。但哲学学习的缺点是：倘若采用“拿来主义”的路线而不去批判和消化，则思想可以作为教条或“原理”，理论可以作为先导或基础，而且容易忽略世界的真相和人生的真谛或理论认识与之如何联系。因为实际上，思想和世界的真相并不是一回事，而思想家也是有个性和有其特殊的生活经历的人，而不是真理的化身和学问的代表。那种认为一个人可以无所不知或无所不能的认识，只是古代关于学问的人格化的一种粗浅的认识，或许只有上帝才可以做到（作为超人或超自然物的存在）。在今天以为某一个人或某一派哲学家就代表某一方面真理的思想认识，就具有这种危险性。这就是以某人的说法代表真理，或者以某一学派学者的观点代表真理或真理性的认识，或者按照哲学流派或社会思想或学术思潮去做学问的弊端。归根结底，哲学可以让人有思想，学会思考问题，但若缺乏基本的怀疑主义态度和探究的问题意识，则哲学也可以让人不思考问题，从而变得无思想，或不会思考问题，以至于丧失做学问的能力，而在谈吐之间仍然显得有学问和有思想。

好在哲学仍然有其自身的问题，而不是要替代或指导一切别的“低级的”（事实或记忆）或“中级的”（技术或技能）学问，如今甚至丧失了哲学作为一切学科基础的考察的功能（如康德所做的那样）。这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是哲学自身有了自知之明的迹象。哲学的问题和领域包括本体论（存在是什么）、认识论（人如何认识或得知）、价值论（有何用，即知识与人的利益的认知关系），还有信仰，基本上可归入意志性认识。其中求真（存在之真理）是一条思路，求智（人类之智慧）是一条思路，求善（社会之利益）是另一条思路。然而，无论从何处开始，一旦进入思考过程，都会从另一个地方出来，形成一个认识的过程，达到某种认识和体悟，进一步则构成一个认识的循环，而其总结性知识则与世界和人生的知识合一，所以称为体（本体）用（功用）不二，也就是一，即合一状态。由此解释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养成彻底探索的科学精神和追问形而上学终极问题的哲学思辨的习惯。文史哲之间的出与入，也带有这样的特点，即从此（如事实）入，从彼（道理）出，也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

把文史哲视为独立的领域，则它们均是面，在独立的领域里活动，犹如传统的农夫耕作在自己的土地（或封建采邑）上，若视为关系，则它们各自缩小为点（在点上可以考虑关系及其距离）。构成关系的联络即是线或线索（如商人的活动），关系即各点之联络，没有联络或联系，则不见整体。古代的本体论是实体，关系是说明性的，功能性的，如今的非实体哲学则认为世界是关系，例如美或审美是关系。但关系既是相互或双向互动，同时更重要的则是多重的关系和连接构成的网状结构，虽然可以说是面，但如果不能深入和渗透到各个点或面而起作用，则仍然有可能是孤立的和同质的面，而不是立体的和多维的结构（即把整体视为复杂系统）。就思维方式而言，在复杂世界的关系和运动中把握事物，是现代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诸如通过主体间性和互文性一类概念）。这是现代学说之所以区别于本质论哲学和实体哲学的一元论的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也有可能超越了二元论或二元对立的认识，但若只是强调多元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和结论，则又难免陷入俗套，甚至在讲文化的时候，多元论也不是终极的观点，而应在思考的方向上回到整体论，但整体里要有事实和材料，有分析和分辨，有观点和见解，才不失为学问。而大学问，或者做学问的自由，就是能够出入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和知识系统，甚至经过极大的努力打进去，再用全部的努力杀出来，如艺术家李可染所说的那样。尤其是对于传统，相

对于创造，则更是如此。

最后，关于这篇小文章，还需做几点补充性说明：其一，本文并非只强调文史哲而忽略任何具体的学科，如语言学、文化学、翻译学，而是认为任何学问都离不开对文史哲的考察，而且任何学科都有文史哲的不同层面和与之不同的联系，何况作者表述的文史哲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史哲，而是借其名称而有所发挥和扩展。其二，并非只提倡通才式学问而忽略专门的学问，甚或自然科学，而是认为任何的大学问，都必须以中西打通和古今贯通为前提（也不可能要求全部知识都如此），而不可能是单一学科的直线迈进，但也不是时下短平快的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其三，只说文史哲之间的贯通和出入游走也不是没有根基的“游侠心态”，如晚清学者那样，换言之，如果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方法训练，任何思想和知识也无助于获得研究的功效，而且只是如此思想也不一定直接导致最理想的知识结构和创造性格局，但至少在进行这种贯穿和迁移的过程中，学问会做得灵动而持久，有基础有后劲，而且符合从必然到自由的探索之道和人文学科的创造精神。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终结与更生

导言

关于建立翻译学的讨论，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各种理论的和实践的努力的背后，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两种翻译学的概念。一个是普遍的科学的翻译学，即不分国别和语种的翻译学；一种是不那么科学的比较具体的翻译学，它可以按照不同的语种和国别而冠名，如称为“中国翻译学”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等等。承认这一基本的认识上的分野，就意味着两种说法各有道理，并有并存的必要。一种认为：既然翻译学是一门科学，科学又是研究普遍的必然的知识体系的，那么，翻译学就不应该是分国别和语种的，而应当是普遍适用的，带有原理性质的，不应强调各语种的特点或某一国家的学术传统和理论特色的。另一种认为，这种普遍的科学的翻译学固然很好，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汉语的特点和汉外互译的特点做一些描写性的、对策性的、语际对比性的理论研究工作，以此为翻译学的建设做一点贡献。

为了使讨论能够尽早进入正题，避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或者在概念上兜圈子，本文作者假定存在着上述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学，至少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存在。并且认为，理想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理应是普遍适用的，具有终极目标性质的纯理论体系，如同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的形而上学所已经达到的程度。然而，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上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所做的一种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简称传统译论）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这里的认识基础包括下列命题：（1）翻译学在本质上应当是理论的，即便这种理论包含对于实践的各种关系，比如，对于以往的翻译活动作出正确的理论说明，或者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原则；（2）在中国现代译论建立以前，我们只能在传统译论中寻找它的理论源泉，并把形成中的中国现代译论视为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个合乎历史和合乎逻辑的发展；（3）不过，这种发展不可能是由传统译论自然而然地成长为现代译论，而应当做一番人为的转换或转化工作。为了实现这个转化，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诠释。鉴于近人已经有了一些局部的有限的诠释工作，我们要做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系统的重新诠释。因为我们相信，成功而有效的现代诠释会促进中国现代译论的诞生乃至中国翻译学的建立，从而为普遍翻译学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

本辑所收的文章，包括了不同时期所写的不同来源的论题，体现不同的研究角度和

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在世纪之交的新译学视野中对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宏观审视,有从资料的整理与理论的阐释等方面对于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也有在中西译论之间,企图对于昔日的文质之争与今日的直译、意译做出概念辨析和历史渊源阐发的,最后,还有作者根据自己的独立观察,总结出的中国翻译学建设十大问题与文化转向以来译界的十大表现。不拘一格,一并收入,一起讨论,权且作为建设中国翻译学的一种努力的开端吧。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资料的整理与理论的阐释

本文是关于中国近几十年来在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与现代翻译学建设问题的关系的研究,不仅介绍中国传统译论领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成就,同时涉及在西学东渐和西方翻译理论进入的语境下,中国译界为建立中国翻译学所作出的努力,即以中国传统译论为基础和起点进行的理论阐发。

一、传统译论研究的基础工程:文本的编辑与注疏、翻译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的翻译传统和丰厚的理论资源的国家,也是具有强烈的史学意识的民族。关于中国传统译论虽然有不少的讨论,也有过一些努力和设想,但事实上,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切地说,只有到了“文革”结束以后的学术复兴时期,才有了比较全面而认真的研究。

首先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原始理论文本的编辑和注疏。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版本有以下三个:

(1)《翻译研究论文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

(2)《翻译论集》罗新璋编,商务印书馆,1984年。

(3)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中国翻译话语读本》英文版),张佩瑶教授(香港浸会大学翻译系主任)编,圣哲罗姆出版公司,2006年。

前两个版本出版在同一年也许是巧合,但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例如,《翻译研究论文集》封面上打有“译学丛书”字样,显然可见其译学理论研究的学科定位意识,而标题下面括号里的“1894—1949”则说明它的理论视野是近现代的历史分期。它收录了37名翻译家或理论家的论文共51篇(从马建忠、严复、梁启超到朱光潜、朱生豪,有的作者,例如鲁迅,不止一篇)。只有杨镇华的《翻译研究》是一本小册子,书中选了第二、四、六、七章,但没有注明出版社和时间,不像其他论文那样注明出处,可谓是一个另类。本书没有序言,但有一个出版说明。其中第一条说道:“译学丛书《翻译研究论文集》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根据章程的有关规定,委托《翻译通讯》编辑部编辑出版的。”《翻译通讯》即是《中国翻译》的前身。第二条讲了出版计划如下:

第一集辑录了1894年至1948年有关翻译理论的文章共51篇。第二集将辑录1949年建国以后有关翻译理论的论文。第三集将辑录我国翻译史资料及翻译家有关文章。以后视条件和需要,陆续按专题编辑出版。(该书P.1)



即使不再叙述这一计划的实施情况，单就这里的说明而言，也可以说，这样一个出版计划不仅是实际的，而且是可行的。它至少说明中国翻译协会在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建设上所起的主导作用，虽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贴近，它比较倾向于现当代的理论关注，而对于传统翻译理论的全面收集和研究，还有待于另外的努力。那就是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新璋编辑的《翻译论集》。该书“例言”数条对于宗旨、体例、选材与编辑等有详尽的说明，以下是第三条：

本书收辑自汉末以迄编定之日有关翻译的论文一百八十余篇，略按时代，分为五辑：第一辑，汉魏唐宋；第二辑，明末清初；第三辑，近代时期；第四辑，“五四”以来；第五辑，解放以后。过去同类选本，大多起自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对古代译论甚少顾及。本书在这方面尚属初创，缺漏不周，知所难免。汉唐部分，大多系经卷序文，偏于择要；明末清初之际，所译多为科技哲理宗教等书，翻译论文渺不可见，但作为翻译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亦选列数文，聊备一格。（罗新璋 1984，P.i）

第七条提到书后所附的“论著与文章索引”，值得一提。其中论著收录了 1932 年到 1981 年间出版的 18 种著作，包括 1932 年吴曙天编的《翻译论》，和 1935 年杨镇华的《翻译研究》，最迟收到钱歌川的《翻译漫谈》和《翻译的技巧》，代表了编者对海外华人译论的关注。文章则广泛收录自各种杂志，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创造季刊》、《新月》、《申报》、《小说月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通报》、《翻译通讯》，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语文》、《外国语》等及各大学学报。约列文 5 000 余篇。虽然收集未必全面无漏，但编者尽力之精神和学术之严谨，给人印象颇深。

本书的编法颇有讲究。各辑除正文部分的论文以外，还收录了若干关于前人论文的研究和辅助资料，称为“研究与资料”，附在后面。例如，第一辑古代部分不仅收录了佛经翻译千年之久的主要论文，而且收录了梁启超、胡适、钱钟书等现当代学者关于佛经翻译的珍贵研究资料。以下各辑的辑录，虽不如此严密和一致，但大体而言，不仅说明编者的研究的眼光，而且说明体例上的创新。

最后一点，便是罗新璋先生的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其中对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各个方面不仅有详细的分析和总结，而且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纲领性的结论：

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分而合，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经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据此，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新璋 1984，PP. 18~19）

关于这一段话，笔者曾经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一书的序言中有如下的分析：

这里的几层意思是十分明确的：

1) 中国传统译论的渊源是古典文论与传统美学，其归宿是正在形成中的“翻译学”。

2) 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已经形成，其主体或主流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一基本线索。

3) 中国现代译论体系的建立要“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就应包括这一传统的译论内容在内。

关于第一、第三点，笔者没有异议。关于第二点尚需作如下说明：

.....

中国传统译论如果说有体系，也是在整体上而言，而不是就某一单独的理论部分而言，因为大部分单独的论点尚未发展到卓然成一体系的完备状态。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尚未完备的译论观点和说法，加以系统的现代的诠释，使其向着现代的系统的理论形态过渡或完成。

.....

中国传统译论如此包括了各方面的“有容乃大”，便有希望增加中国译论传统的覆盖面和对于众多翻译理论问题的辐射力和渗透性；不仅可以在单独的个体译论的层面上进一步加深和扩展同一论题，而且可能在中国传统译论的整体态势和综合实力上展示和开拓现代译论的理论基础及其文化资源。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目前在罗新璋先生所做的开创性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所能做的事情。那就是说，以中国传统译论的文本为基础，进行现代译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的诠释工作，不仅是为了清理古典的译论资料，而且更重要的则是为建立现代译论准备条件。尽管老一辈学者包括梁启超、胡适、钱钟书等先生曾为之做过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但是因为治学方法的不同和理论视野的不同，他们的工作还应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推进。（王宏印 2003，PP. 2~4）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罗新璋先生对于传统译论的态度和由此生发的关于翻译学建设的思考：

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家，已为我们建立我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我们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国外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罗新璋 1984，P. 19）

总结罗新璋先生《翻译论集》的主要贡献，大体如下：

（1）尽可能系统而完备地收集了中国传统译论各时期各方面的论文和资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资源库，为后人研究提供基本文献；

（2）提供了十分必要而且比较系统的研究性资料，包括某一专题的相关研究资料和论文与论著索引，为后人提供研究上的方便；

（3）具有很强的史学意识和学科意识，对于我国翻译理论（主要是指传统译论）有系统而比较准确的论述，奠定了有关研究的基础。

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是近来《翻译论集》出了新的版本，那就是《翻译论集》2009年修订版。与第一版相比，这一次除了编者增加了陈应年先生之外，在实际的内容方面也有了一些更新。现一并说明：

（1）事实上，初版“例言”第九条就有这样的说明：“本书由罗新璋编纂，陈应年同志亦力主其事，自始至终参与编选工作。”修订版整个“例言”仍用1982年版。

（2）原始文献有所增加，并有个别顺序的调整。例如，近世部分增加了徐光启的《历书总目表》，魏象乾的《缙清说》。



(3) 研究与资料部分增加了若干重要的篇章。例如, 古代部分的研究与资料增加了陈寅恪的《童受“喻鬻论”梵文残本跋》、《“大乘义章”书后》, 周一良的《论佛典翻译文学》, 杨廷福的《略论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等。

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传统译论的文本编辑和疏解, 特别是以外文的形式出现, 是在 2006 年圣哲罗姆出版公司 (St. Jerome Publishing) 出版的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中国翻译话语读本》英文版), 它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张佩瑶教授负责编辑注释, 并由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林茂荪先生做顾问编辑的一个合作产品。其编辑委员会有中国内地主要高等院校的老年中青年教授, 而三位翻译都是在香港受教育或任职的专职翻译。这样一个编辑和翻译阵容显示出一种海内外合作的态势和实力的纠合, 可算做一条经验。第二条经验就是国际的合作, 它在一开始就直接和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翻译专业出版公司联系, 委托其负责出版发行, 让该书直接进入国际翻译图书的核心市场, 而不是像一般国内的典籍翻译那样因为对外渠道不畅通往受制于国内图书市场。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第三条成功的经验就是这项工程的推动者, 是中国译协的高层领导。林先生在国内外都有相当的威信和影响力, 所以这项工程也标志中国译协在《翻译研究论文集》以后的一种更高层次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和推广力度。总而言之, 它代表中国传统译论以新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精彩的亮相。

事实上, 历时六年经过各方努力终于部分面世的这个《中国翻译话语读本》, 是一个两卷本, 其时间跨度从早期到 20 世纪前十年。已经出版的只是两卷本的第一卷:《早期到佛经翻译》, 这一阶段基本上属于“政府翻译”行为, 历时千年之久。其第二卷《13 世纪到 20 世纪》, 主要涉及西学东渐时期的翻译, 以辛亥革命为结束。目前正在积极准备中。我们一方面祝贺这项成果的第一卷的完成, 同时也希望第二卷早日问世, 并能够更多地吸收新成果和新观点。

以下是上卷的大体情况,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概要:

就选材而言, 上卷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 早期到东汉, 包括 25 种文献, 其中有孔孟、老庄、易经、礼记、尚书、国语等, 选其与语言和交际有关的片段进行注疏, 显示了比较深厚的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渊源和对于翻译的深刻影响与资源背景。第二部分: 佛经翻译 (分为三个时期), 共包括 67 种文献, 道安、僧肇、彦琮、玄奘、赞宁等, 属于直接的翻译理论资料, 收集比较全面详尽, 有的是片段, 有的是全文收录, 均具有代表性。这本书中 95% 的文献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对世界披露, 所以翻译的质量和理念是首要的问题。其翻译宗旨如下:

就本书的中国翻译话语读本而言, 我们力求从四个方面实现其厚重翻译 (Thick Translation) 理念:

- 1) 如何可以表达中国翻译话语的关键概念的丰富涵义, 而不是依赖目的语中显而易见的对应概念加以替代, 以免忽略其中重要的差异和区别?
- 2) 如何可以超越语言与文化的衡沟, 能确保中国翻译话语的突出特点获得充分表现?
- 3) 如何可以使关键概念所植根的文化传统得以表达, 或文化传统的感觉得以激发出来?
- 4) 如何可以提供必要的历史与其他背景信息以便促进理解?

(张佩瑶 2006, P. 3)

从文本样式的角度来说,选文的经典与评注的准确几乎同等重要。继承传统学术精神和善于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是这个选本的一大特点。例如,在关于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评论中,注释者首先提到了古人例如彦琮的研究,其后着重介绍了现当代著名学者的研究情况,例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基础上从形式、风格、语言特点等文类因素的丧失角度对道安问题的认识。钱钟书既认为道安的论述重要,但也认为其有不足,所以力图就翻译的性质和可能性的理论问题有所推进。罗新璋则力图在“文革”之后打入历史和传统,拨乱反正,认为中国传统译论有其自己的体系,而“案本”是其中关键术语之一。王宏印继承罗的思想,认为发展中国译论必须重新认识传统译论,在更新传统中产生新知,特别是从本体论的哲学高度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经典文本。(P. 82)应当说,这样的概括是既溯源有自又推陈出新的,值得肯定。

强烈的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构成本书编写的一条基本原则。例如,在体例上,本书除了大量正文、脚注和疏解、评论以外,在书前书后还有大量的附录,书前的包括(1)地图:丝绸之路:21世纪初的东方,实际上构成和西方的对应关系,(2)中国历史朝代纪年表,(3)汉英系统发音对照表;书后的包括(4)书中人物小传,(5)引文出处索引,(6)分类参考文献,(7)主题、姓名及一般文献索引等。

为了帮助西方读者确切地了解中国古代的翻译情况,本书在地域及语言方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西域”概念和“胡语”的概念,区分了和“西方”相对的地理知识,和与“梵语”相对的“胡语”知识。例如“西域”概念:

中国古代地理命名系统中的“西域”并不指今天的欧洲诸国或地区的“西方”概念。“西域”只是当时中原以西的笼统概念,根据中国历史资料,“西域”指玉门关以西,包括今日新疆和中亚的一部分(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及以西的绿洲地带)。为了使读者能够感受旧时中国人头脑中的世界,不拟用更为精确的表述方式替代中国地理的命名系统。(张佩瑶 2006, P. 5)

由于“地理命名系统的不严谨,加之佛经流播领域的多语混杂状态,导致讨论佛经文本语言的普遍含混不清。中国的史书记载,往往认为佛经以胡语(本书译为 Hulan-languages)写成。这是一个中亚诸语言的集合名词。”(P. 6)以下征引了现代学者吕澂中亚语言五分为胡语的说法,并提及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的说法,以及马祖毅历代译语各有不同的思想。兹不详论。

最后,关于本书的话语问题,实际上牵涉到编撰本书的一个主导思想。本书标题使用“话语”而不使用习见的“理论”、“思想”等术语,自然有其学术的考虑,其本身的说明尤其体现了编者学术的新颖和思想的敏锐,同时也避免了中国有无理论一类学术观点的争论:

“话语”一词是在普通的含义上的话语:“思想的表达;尤其是口头或书面语中的正式的普通的表达”,而且“话语”也是富柯和其他后现代批评家所使用的意义:“话语”暗示这样一种观点,口头和书面表达决非纯粹而单纯,而是与意识形态和权力处于交错的关系之中,它能规范知识,建立认识论框架,塑造心态。本选集标题中所使用的“话语”一词是处心积虑的仔细选择的结果,可选项目包括诸如“中国翻译理论读本”,“中国诸家翻译理论读本”,“中国翻译思想读本”。其目的在于强调一点:没有书面文章是在意识形态真空中完成的。赞助人、诗学、经济状况在本书的篇章中处处打下烙印,……(张佩瑶 2006, P. 1)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翻译话语读本》的成功经验：

(1) 它创造了一种中与外、大陆与港台、学术界与出版商多边多人多方合作的典范，避免了个人盲目编撰翻译大部头作品和中译外书籍往往出口转内销的可悲局面；

(2) 创造了一种向西方世界开放和对话的文本翻译模式，包括正文的翻译与注释疏解、各种附录与参考索引，以及面向西方读者和学术界谈话的序言与话语系统；

(3) 它确立了中国传统学术在现代西学东渐条件下的一种崭新的学术姿态，面对西方现代译论的大潮涌动，中国翻译话语的深厚学养和高品位的语言与装潢设计，是形象工程。

当然，本书的缺点也是有的，包括知识问题和偶然失误，例如，将今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译成“新疆省”(Xinjiang Province)，就是有问题的。但瑕不掩瑜，我们肯定本书的巨大成功，并望早日见到下卷的问世。另外，我们也希望《中国翻译话语读本》有一个相应的中文版，以适应国内读者的阅读和教学研究活动。

二、传统译论研究的开启之作：理论的分析与现代诠释

如果说中国翻译理论文本的编辑与注释工作的奠基性工程始建于1984年的话，那么，中国翻译理论史的正式问世则在八年之后的1992年。这一年，陈福康先生的《中国翻译理论史稿》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广泛，影响持久。事实上，第一次以翻译理论史的形式出现，这本书标志着中国翻译理论独立成史。它比较系统而中肯地介绍了中国古今各家翻译理论，并有简要的评说，其持论平允并有独到见解，兼有专著和教材的双重作用。事实上，作者不仅考察了罗新璋的理论提法和马祖毅的历史分期，而且在编写上有所回应和继承。

2005年，这本书出了修订版，“除了文字、修辞上的修订外，主要是增写了蔡元培、邹韬奋等专节，对严复、鲁迅、周作人、瞿秋白、钱钟书等节作了较多的补充，对翻译文论参考篇目也作了增补”(该书后记P.528)。另外，作者认为中国历史编写中“古代”以外，近代、现代、当代的提法不准确，故而删掉这些提法，直接以时间为题，古代之外，用“晚清明初”、“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等概念，反而明晰了。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理由，在修改后的引言中十分明确，要之有四：了解历史真相回答理论问题，是其一；满足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需要，是其二；开展翻译研究，提高理论水平，是其三；有益于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是其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的博士，作者对于翻译理论史有如此见解并勉力而行，获此成就，实非易事。

严格说来，从理论史到研究专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是各家理论研究的积累过程，它特别适合于单独一种理论的专门研究；一个是对于中国译论总体精神的顿悟认识功夫，特别是要企图真正贯通性地认识和掌握中国译论精髓的时候，总体的认识必不可少。这两个方面的完全具备，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史的必要条件。以下就后一种努力以及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论列两项，加以比较研究。

(1)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王宏印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张思洁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关于《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从未发表的“内容简介”：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是一部运用解释学方法系统清理中国翻译理论传统的研究